

古文真賞
卷之六

卞之琳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卞之琳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卞之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978 - 7 - 5004 - 7628 - 3

I. 卞… II. 中… III. ①卞之琳 (1910 ~ 2000) —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391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徐幼玲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4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卞之琳先生（1910—2000）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也是成就卓著的学者。这里所收的论文是卞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和诗歌及翻译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论〈哈姆雷特〉》、《论〈奥瑟罗〉》、《〈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三篇文章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后来收入《莎士比亚悲剧论痕》（1989年）一书。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结集出版时文章基本不改，只是“摘去一些本不恰当或属多余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标签”。《〈高加索灰阑记〉的诗情画意》一文选自于1961年的系列论文《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1962年的《世界文学》杂志连载三期，1980年出版）。

除了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外，卞之琳先生还翻译过数种法国文学作品，如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纪德的《窄门》和《新的食粮》。他在北大读本科时就发表过象征派诗歌的译作，可见他的法文翻译是早就得到认可的。《安德雷·纪德的〈新的食粮〉》是小说的译序，也是一篇很好的论文。还应该提一下这篇文章是卞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1942年），创作时间在本文集里最早。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期，如何看待现代派文学是当时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分和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是卞先生在1978年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经整理后收入《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79年），现在读来仍非常有意义。

卞之琳先生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诗歌格律和中英诗歌的异同。本文集中《说“三”道“四”：读余光中的〈中西文学之比较〉，从西诗、旧诗谈到新诗律探索》、《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和《重探参差均衡律》三篇文章是卞先生在这方面研究的精华。

关于闻一多、梁宗岱、叶公超和冯至的四篇文章史论兼备，是充分反映卞先生学养的佳构。文集里的压卷之作是卞先生自选诗集《雕虫纪历》的序言。这篇文章堪称作者对自己诗歌创作的总结，对中国诗歌研究者是大有帮助的。

陆建德

2007年3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论《哈姆雷特》	(1)
论《奥瑟罗》	(91)
《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	(159)
《高加索灰阑记》的诗情画意	(202)
安德雷·纪德的《新的食粮》(译者序)	(234)
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259)
说“三”道“四”：读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 从西诗、旧诗谈到新诗律探索	(272)
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	(281)
重探参差均衡律	(298)
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	(312)
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	(324)
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	(337)
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348)

《雕虫纪历》自序 (358)

作者年表 (377)

论《哈姆雷特》*

一

《哈姆雷特》这个悲剧是莎士比亚的中心作品，最丰富的作品；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已经在西方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世界各国的导演和批评家往往把这出戏当做自己的毕业课题；翻译家总想译一译这部作品；演员总想演一演这个角色。三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种种不同的译本，种种不同的演出，真是五光十色。莎士比亚在这个剧本里，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集中地概括了一定社会历史的主要和本质的现象，非常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深刻的矛盾。谁都从哈姆雷特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指得出一点什么，说得出来一点什么。这一点什么，那一点什么，往往是对的；问题是这一点什么，那一点什么，又往往是互相抵触的，难以得出一个统一的全貌。主观主义唯心论的评论就是最容易钻牛角尖，闹成“瞎子摸象”。我们试

* 本文和《论〈奥瑟罗〉》、《〈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三篇文章选自卞之琳著《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三联书店，1989）。——编者注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的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求一个全貌的认识。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决不容许形而上学式的使一个古典作家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僵化成一个画谱里的定型。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在统一的全面认识之下，凭它的深刻性，凭它的能动性，还是容许各时代人民层出不穷地创造性地体会，从中汲取永远是活的教育意义。

这里就试图初步提供一个大致不差的全貌的认识。我们首先把莎士比亚的这部中心作品放在作者写的时代里、社会里，放在作者前后左右的作品当中，从全面看它，确定这部作品里的中心人物的全面轮廓是怎样，然后进一步分析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艺术——最后这不可分割的三点也就是哈姆雷特这个不朽形象的力量所在。

二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第3幕第2场里，使哈姆雷特就演戏说（亦即就剧作以及一般文学创作说），它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要照出“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剧作家本·琼孙也把莎士比亚称为“时代的灵魂”^①。我们要了解莎士比亚，特别是《哈姆雷特》，不能不先看看他的时代，特别是他写作《哈姆雷特》的时代。

莎士比亚的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是封建社会基础崩溃和资本主义关系兴起的交替时代。

^① 本·琼孙（Ben Jonson）第一对褶本《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1623）。译文见卞之琳编译的《英国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过程里充满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与联合。15世纪以来，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中世纪社会制度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就表现为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和天主教会，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王室和后一方面是联盟关系。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到15世纪末尾，都铎王朝起来，主要靠资产阶级的支持，利用“玫瑰战争”削弱了贵族权力的条件，利用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势力的条件，基本上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英国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本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强大王国”^①。战败贵族的地产、教会的地产，转移到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手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贵族化的资产阶级的手里，“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②，“合并于资本”^③，支援了向海外的商业扩张、殖民地掠夺，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推进了一大步。亨利第八以来，特别在伊丽莎白朝的全盛时代，王室和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盟达到了平衡的状态。可是王权统治，本质上究竟还是属于封建性的，就会随社会发展而日益暴露它的腐朽性、反动性，因此到伊丽莎白朝的最后几年，1600年左右，王室和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又开始展开了。

另一方面，历史的担子实际上向来都挑在一个“无名氏”的肩上，社会进步的代价实际上主要都是由这个“无名氏”付出。这个“无名氏”就是人民大众，劳苦大众。原始积累时期的历史，马克思说，“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

① 《自然辩证法》导言。

② 《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第7篇，第24章。

③ 同上。

的”^①。他又说，“农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剥夺，就是这全部过程的基础”^②。这个过程的受害者主要就是耕种大贵族大主教领地和使用公地的广大农民。工商业发展也是靠驱使广大农民首先无家可归，其后流入城市，以廉价劳动，为资本家生产。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在当时就形成了社会上的次要矛盾。可是这种矛盾眼看就要转变成主要矛盾的，所以也不可忽视。

因此，莎士比亚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残酷的时代。

就一方面而论，伊丽莎白朝的全盛时代，英国对内消灭了从事于封建杀伐的贵族权力、自作主张的天主教会势力，对外摧毁了海上霸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因此工业发达，商业繁盛，同时民族文化繁荣了，先进思想传播在大学内外，与人民大众并不脱节而以戏剧为主要形式的文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这个时代，由于封建桎梏和宗教控制的打破和摆脱，由于地理上和知识上的新发现，启发了人的觉醒，开拓了人的眼界，激起了民族自尊心和民主倾向，肯定了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类前途的理想和信心，这一切形成了“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就另一方面而论，羊毛业和以后毛布纺织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贵族化的资产阶级，进行“圈地”活动，把耕地改为牧场，把公用空地占为私有围场，把农民从家屋里赶出来，从土地上赶走。这种剥夺农民的过程，在 14 世纪已经开了

① 《资本论》第 1 卷，中译本第 7 篇，第 24 章。

② 同上。

头，到都铎王朝进入了高潮^①，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也还并没有完结。亨利第八朝的人文主义者托麦斯·摩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里说“羊群把人都吃了”，它们“使庐舍荡然，市井为墟”^②。伊丽莎白朝的菲立浦·斯塔伯斯在 1583 年也说：“这种圈地活动使富人吃掉穷人、像畜生吃掉草。”^③ 这些成千上万的从土地上赶出来的农民，扶老携幼，到处觅食，在道路上颠沛流离，再加上贵族解散出来的家丁家将，寺院封闭出来的人手，不但做流民、乞丐，而且有时迫不得已，要犯些盗窃行为。这样，他们侥幸没有饿死，也会随时被官府抓起来，照禁止流浪的法律，抽鞭子或者送上绞刑架。据说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三四百无赖者，系成行列，被牵上绞台”，而女王自己在一次出巡国内各地以后，也感叹说，“到处皆是待救恤的穷人”^④。马克思把这些受惩罚的人群称为“今日工人阶级的祖宗”，同时又说这些“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或‘自由’的）无产者，要想一被赶到世界上来，就为新兴的手工制造业所吸取，当然是不可能的”^⑤。他们中一部分侥幸能到大城市的工场里做工了，他们的待遇又是怎样呢？据说英国劳动工资，历史上最低的年份是 1550 年至 1600 年，正好包括了伊丽莎白朝的全盛时期！

这两个方面交织成这样的光景：

① 摩敦（A. L. Morton）：《人民英国史》（1948）第 6 章。

② 《乌托邦》第 1 卷。《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第 24 章里有引文。

③ 斯塔伯斯（Philip Stubbs）：《时弊的分析》（转引自布拉克——J. B. Black——《牛津英国史》中《伊丽莎白朝史》，1936）。

④ 《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第 24 章。

⑤ 同上。

伦敦当时由中世纪的普通海港一跃而成了世界的中心^①。伊丽莎白女王的几个主要王宫都对着泰晤士河，我们可以想象她从窗口看得见多少船舶来往的盛况。当时著名的探险家德雷克，在1580年环航全球回来，女王亲自上船，册封他爵士的时候，心中自然有数，明知道船舱里压着血迹斑斑的从海外掠夺来的金砖。女王从德雷克这次航海掠夺上因投资而获利25万镑^②。人才荟萃的女王宫廷也就是统治阶层各种集团互相倾轧的焦点。号称英主的“贞洁”女王，在她左右宠臣当中，看谁的面孔漂亮，就赐他这样那样的贸易垄断权的照会，一时不高兴起来，又会打他耳光，取消他的照会。当时的大人物差不多都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可是自己身兼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的培根说他们泰半都贪得无厌，而他自己也以贪鄙出名，而且在他的朋友，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失败的时候，也不惜落井下石。财富忽然集中到新贵手里，他们就穷极奢华。显贵雷斯特伯爵一次在乡居给女王接驾开宴，上菜一千碟，由200家臣侍候；而农夫和工匠经常吃豆粉一类做的黑面包，偶然碰上一顿鹿肉一杯好啤酒，就自比伦敦市长^③。同王宫和贵人府第遥遥相对的，有随时在威胁的大监狱伦敦塔。伦敦塔又是当时的武库、钱库、王室珠宝库。街上的叫卖声、叫卖谣曲本的歌唱声，间或呼应着监狱里的一些惨叫声。有名的圣地圣保罗教堂就像北京从前的隆福寺、苏州从前的玄妙观。烘托着高楼大厦，烘托着万商云集，烘托着歌舞升平，都是伦敦的狭窄的陋巷、拥挤的小屋，脏臭不堪，疫病流行。1593—1594年

^① 这一段的综述，在这一点以外，还有几点也采用了多弗·威尔孙（Dover Wilson）提法，参看他的《莎士比亚简论》（1932）；有些材料取自拉雷（Walter Raleigh）编《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1916）等书。

^② 转引自劳孙（J. H. Lawson）：《隐蔽的遗产》第2部第6章（1950）。

^③ 参阅布拉克《伊丽莎白朝史》。

发生的鼠疫，特别厉害，一下子卷去了1万至1.5万条性命，而伦敦当时还只有12万人口。宫廷要看戏，倒也罢了，伦敦市内东一处西一处盖起了公众戏院，工徒最热心去看戏，使店老板深恶痛绝，结果市政当局几次下令禁止演戏；另一方面，政府对演戏，就像对出版一样，执行严格检查的制度，出言不慎的就会遭坐狱或杀身之祸。伦敦见识过大军凯旋的热闹，同时农民起义威胁过伦敦；而在伦敦市内工徒们也时常聚众骚动。

这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不能分开的，可是大致上在16世纪末尾以前和17世纪开头以后，情势分成了两种。以前，光明面是当代留给大家的主要印象；以后，是阴暗面。

伊丽莎白女王死于1603年。传说她生前逢到外国使节问起她怎样使她统治下的英国得到稳定的诀窍，就跳几步舞给他们看：那就是平衡的作用^①。可是她死前两三年，英国的平衡状态失去了。1601年议会开会的头几天，她有一次亲自到议会，走过下院议员中间的时候，极少人向她照例说一句“上帝保佑陛下”^②。宫廷所代表的王室、新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腐败，日益暴露它的封建本质（到1603年詹姆士第一上来以后就更进一步），一般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日益要求他们的统治地位，二者之间，展开了矛盾，使原先的联盟破裂了，预示着17世纪中叶革命风暴的来临。这种开端具体反映在资产阶级，在1601年，反对女王政府支配垄断权的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预示着日后总有一天要发生的另一种革命。这种开端具体反映在同一时期内伦敦工徒们在终于变成工资劳动者以前的骚动。1601年2月发生

① 多弗·威尔孙：《莎士比亚简论》。

② 哈里孙（G. B. Harrison）：《伊丽莎白朝琐记》。

的艾塞克斯事件，虽然像只是宫廷内部斗争的事件，却是戏剧性地反映了社会上的动荡不安。这个煊赫一时的大人物，失宠以后，苦求女王恢复他的甜酒专卖权，不成功，就听从门客的怂恿，想利用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掀起叛乱。他们头一天设法使莎士比亚的旧作《理查第二》演出来，表示君王无道可以废位，第二天就出动，到伦敦市上，登高一呼，无人响应，结果为首的都被抓起来，这个大人物后来首先上了断头台^①。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阴暗面并不是 1600 年左右才开始的，可是由于 1600 年左右的这些事件，特别是震动全国的艾塞克斯事件，大家才把注意力从这个时代的光明面转开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矛盾；艺术复兴也就到闭幕时期了。

所以十六七世纪的交替又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

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最高峰的许多现实主义的戏剧，基本上都表现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充满了要求人类解放的战斗性、人民性。只是从 16 世纪末尾开始，就出现了许多愤世嫉俗的著作，表现了逐渐渗透当代人心情的“忧郁”。舞台上风气也转到阴惨的方面，不但莎士比亚，其他剧作家，例如恰普曼、本·琼孙、玛思敦，不管形式上写的算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流露着这一种气氛。《哈姆雷特》就是这种忧郁表现的最高峰。

三

时代是这样，和时代相应的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思想发

^① 关于这一段的主要提法，参看莫洛佐夫的俄文本《莎士比亚悲剧集》序（中译本《莎士比亚论》，见《译文》1954 年 5 月号）。

展，又是怎样呢？

本·琼孙说莎士比亚“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①，正因为他是“时代的灵魂”（不是皮毛），照我们目前的说法，正因为他通过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了深而且广的不朽的人民性。

他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人民性，又是怎样得来的？

从莎士比亚有限的生平资料中，我们知道他是乡下城镇的市民阶级出身，晚年退休到家乡过的是市民阶级水平的生活。可是他在主要创作时期又大致都住在工商业中心、政治中心的伦敦，主要靠为舞台做各种工作，特别是靠一管笔，赢得他的生活资料。他上台演过戏，干过当戏子这项“贱业”，当时社会上写戏也是不体面的营生。我们可以判断，由于他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活动两者之间的互相结合，互相推动，他在伦敦期间，同社会各阶层，从工徒、水手、青年学生到王公贵人，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还是新兴的进步阶级，反对封建割据，反对封建束缚，要求民族统一，要求自由，要求民主，与广大人民利益相一致，但是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与人民利益也有矛盾。当时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内的作家，越是伟大，越是能发扬本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思想，越是能在揭发封建阶级的罪恶本质的同时，也揭发本阶级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倾向，因此在作品里表现了较少的阶级局限性、较多的人民性。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这样生活，也就具备了思想上少受资产阶级限制的条件。生活面的这样扩大也使他更多地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艺术文化的教养，再加上他显

① 第一对褶本《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